
評柯馬丁《秦始皇石刻 ——早期中國的文本與 儀式》

Kern, Martin. *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 New Haven, Con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0. Pp. viii+221.

[中譯本] 柯馬丁著，劉倩譯，楊治宜、梅麗校：《秦始皇石刻 —— 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早期中國研究叢書》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200頁。

尤銳（Yuri PINES）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東亞系

金方廷譯，朱銘堅校

書
評

秦朝（前221-207）的國祚雖短，但在中國歷史上卻具有極為突出的地位。它不但結束了連綿近五個世紀的列國之爭、統一了「天下」，更重要的是為中華帝國政體打下了堅實的行政、社會、政治和思想基礎，使其得以在隨後兩千年裡稱雄於東亞大陸。尤其是秦王政（前246年

即位秦國國君，即後來的秦始皇帝）在前 221 年以「皇帝」名號自居，所開創的帝制成為中華帝國最重要的「政治機關」（political institution）。沒有「皇帝」這個角色，中華帝國根本無法想像。儘管幾千年來秦始皇帝（前 221–210 年在位）一直因殘暴寡恩而受盡世人唾罵，所開創的王朝也在他駕崩後三年黯然結束，但秦朝無疑在中國政治進程上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儘管秦朝在各方面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秦朝史研究卻被二十世紀西方漢學界所忽視。卜德（Derk Bodde）影響深遠的 *China's First Unifier: 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中國首位統一者——以李斯生平為觀照的秦朝研究，1938 年），是數十年來唯一一部以英文寫成的秦史專著，再加上其為《劍橋中國史》第一卷（中譯本名為《劍橋中國秦漢史》）所撰寫的秦史一章，基本構成了英語讀者的主要參考讀物。¹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1 參見 Derk Bodde, *China's First Unifier: 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 (280?–208 B.C.)* (Leiden: E. J. Brill, 1938) ; Bodde, "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eds.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102（中譯本見卜德著，楊品泉譯：〈秦國和秦帝國〉，載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張衛生、楊品泉校：《劍橋中國秦漢史：公元前 221–公元 220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3–120）。與之相反，不少中國和日本學者作出精深的秦史研究，數量更從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激增。俄羅斯漢學家對此亦同樣關注，以嵇遼拉（Leonard S. Perelomov）為佼佼者，曾發表影響深遠的專著 *Imperiia Tsin'—Pervoe*

與秦朝相關的重大考古發現相繼出現，包括秦始皇兵馬俑及在湖北雲夢睡虎地 11 號墓出土的大量秦代法律和行政文書以及占卜書等，催生出大批重要著作問世，但鮮有學者嘗試對秦代史的基本問題作重新檢視。英語的教科書與學術論著仍然保存了秦朝的殘暴、「法家」、「反儒」和「非古」的形象。這種形象在一定程度至今未變。

學者們何以不願重新審視秦代史，背後的主因並不難察覺。長久以來，就秦朝的意識形態、文化認同及其施政是否得當的種種討論，大都圍繞著一部充滿矛盾說法的重要史籍——司馬遷的巨著《史記》展開。尤其是卷六〈秦始皇本紀〉，長久以來一直是中華帝國首個王朝幾乎唯一的史料。司馬遷在敘事方面取得極高文學成就已毋庸置疑，但有關《史記》可靠性的意見分歧極大。有些學者仍慣性地套用司馬遷的觀點，彷彿其觀察就是純粹史實的反映；不過更多學者指出，太史公筆法背後似乎潛藏著個人動機，驅使他蓄意抹黑秦始皇的形象。令人尤其在意的是《史記》對秦始皇的刻劃，跟司馬遷所侍奉並遭其迫害的漢武帝的行事出奇地相似。司馬遷的敘述固然相當精巧，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反秦的諷刺書寫，但可以肯定地說太史公筆下一部分敘事過於渲染緣飾，反而使許多學者不敢過

Tsentralizovannoe Gosudarstvo v Kitae (Moscow: Nauka, 1961) 和其他相關論文。

於依賴〈秦始皇本紀〉的記載。² 是以英語學界的秦研究顯得滯步不前。

只有放到上述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為柯馬丁（Martin Kern）《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一書的重要性估價。正如書名所示，本書重點在於對七篇秦始皇刻石（凡秦「碑」均稱「刻石」）的石刻文作細緻的文本分析。這些刻石都是始皇統一天下後，在各地巡遊時下令於名山樹立的。著者通過悉心探索石刻文語言、內容和禮儀語境，很有說服力地提出以下論點：首先，這幾篇石刻文都是真確可靠的秦代史料，不能以為出於太史公杜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篇刻文——即嶧山刻文——未見載於《史記》，是出自拓本）。其次，石刻文是秦文化傳統的代

2 卜德（見上注）和後來的學者已反覆論及司馬遷對秦始皇的看法，與《史記》可靠性的問題；這裡列舉一部分優秀之作，從中可見各家的分析和結論大相逕庭：Stephen Durrant, “Ssu-ma Ch’ien’s Portrayal of the First Ch’in Emperor,” in *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 eds. Frederick P. Brandauer and Chun-chieh Hu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28–50（中譯本見杜潤德著，陳才智譯：〈司馬遷筆下的秦始皇〉，《漢學研究》第六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28–348）；Michael J. Puett 普鳴，*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尤其頁188–191；Hans van Ess 葉翰，“Emperor Wu of the Han and the First August Emperor of Qin in Sima Qian’s *Shi ji*,” in *The Birth of an Empire: The State of Qin Revisited*, eds. Yuri Pines 尤銳，Gideon Shelach 吉迪，Lothar von Falkenhausen 羅泰，and Robin D.S. Yates 葉山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239–57。

表性文本。第三，它們是獨立和可靠的珍貴史料，有助重構秦帝國的思想、文化等面向。著者透過討論這一組石刻文，對有關秦代文化歸屬性、秦統治者的思想認同和早期中國史學等方面的普遍認識作重新評價。這些分析使本書成為上古中國史其中一部最精湛的研究論著：論證過程一絲不苟之餘，又能提出大膽的詮釋，並為日後的研究開拓了眾多新方向；事實上自本書出版後，採用這種新觀點和思路寫成的論著已相繼出現。

在柯馬丁多方面的貢獻中，以他翻譯的石刻文最為出色，為嚴謹的學術翻譯樹立了新標準。其譯文融會了中日注疏傳統之長，落筆極為矜慎，而且附有中文原文，讀者如對照和思索譯者的遣詞用字，或對個別字詞得出不一樣的詮釋。不過筆者認為柯馬丁異常詳盡的注釋最值得稱道的地方是，非但指出了刻文在不同傳本中的異文，並且將秦始皇石刻文放到戰國至漢初的豐富文本傳統下考察。讀者從這部細緻的論著可以體會到，無論是刻文的語言風格或內容都與先秦晚期的學術環境一脈相承，從而駁斥了所謂秦國乃周朝「文化他者」的普遍看法。

柯馬丁本書的第二項主要貢獻是，否定了一個西方學界長年有關秦國文化歸屬性的偏見。戰國及漢代文獻中有大量貶損秦朝的負面評價，其中以《史記》為甚，將秦朝明確界定為「半蠻夷」政體，目之為身處周文明邊緣的文化外來者。卜德等幾代西方學者一直延續了這種偏見，至今未絕。西方一眾考古學者最早質疑這種錯誤看法，以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的論述最為突

出；³ 不過柯馬丁是第一個從秦代文本文化的角度，毫不含糊地破除這個迷思的學者。在第三章裡，著者分析了可以視為秦始皇刻石前身、具有禮儀特色的文本，即春秋中期（公元前七至六世紀）跟秦國君主有關的隨葬青銅器和石磬上的銘文。這類早期金、石銘文充分揭示，秦國統治階層在文化上非常貼近周文化圈；而這種文化認同不僅體現於銘文的文辭，可以與更早的周代金文和《詩經》明確地對應起來，更見於作為銘文載體的青銅器，其形制表現得「相當傳統」，「幾乎都具有復古傾向」（中譯本頁93），可說是追摹周初形制的復古器。柯馬丁的觀察加上羅泰大量的研究，可以視為英語學界重估秦國文化認同進程裡的一大里程碑。⁴

3 羅泰率先就秦國作為周文化圈的一份子展開討論，見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羅泰，“The Waning of the Bronze Age: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770–481 B.C.,”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s. Michea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52–544。劍橋中國上古史按柯馬丁在撰寫本書時未能參考此書，但融入了羅泰一篇早年研究的部分見解，見氏著：“Ahnenkult und Grabkult im Staat Qin: Der Religiöse Hintergrund der Terrakotta-Armee,” in *Jenseits der Großen Mauer: Der Erste Kaiser von China und seine Terrakotta-Armee*, eds. Lothar Ledderose and Adele Schlombs (München: Bertelsmann Lexikonverlag, 1990), 35–48。

4 羅泰的其他著作繼續對這一進程推波助瀾，如氏著：“Mortuary Behavior in Pre-imperial Qin: A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vol. 1,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ed. John Lagerwa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4), 109–72。另參 Gideon Shelach 吉迪 and Yuri Pines 尤銳，“Power,

著者的第三項主要成就是，恰如其分地將秦帝國的意識形態放回上古思想史脈絡之中。秦朝向來被視為「法家」、「反儒」和「非古」的政權，著者敢於對此提出質疑，實在需要不少的學術膽量。首先，著者摒棄了那種將先秦時期思想體系劃分成一個個敵對流派（如儒家、法家、道家等）的後設觀點（儘管至今仍非常流行），證明許多關於治國之道、社會和政治制度、「因時而變」、孝道重要性等核心思想為大量先秦文獻所共有，而這些看法都充份見於秦刻石。無論從內容或詞彙來看，我們都無法逕直將石刻文與某一假定存在的諸子流派掛。⁵ 其次，柯馬丁反駁了董仲舒等思想家和東漢儒者所不遺餘力鼓吹的一種說法，即應將秦朝視作中國史上的文化或意識形態異數（所

Identity and Ideology: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of Qin (770–221 B.C.),” in *An Archaeology of Asia*, ed. Miriam Stark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5), 202–30, 以及收入尤銳等主編 *The Birth of an Empire* 內的論文。

- 5 20 世紀中國學術史研究基本為「百家爭鳴」的「敵對流派」說主導，但後出的研究已對這種研究範式的不足大加置疑，尤其見 Mark Csikszentmihalyi 齊思敏 and Michael Nylan 戴梅可，“Constructing Lineages and Inventing Traditions through Exemplary Figures in Early China,” *T'oung Pao* 89.1–3 (2003): 59–99；另見 Yuri Pines 尤銳, *Envisioning Eternal Empir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4–5ff。

謂「閏朝」)。⁶ 著者有力地證明這個論述可以全盤推翻：石刻文完全繼承並創造性地挪用了此前周朝和秦國思想傳統，甚至對漢代郊廟祭歌等漢初禮文有著直接的影響。柯馬丁可說完全恢復了秦朝在中國歷史和思想長河裡的地位，毫不含糊地反駁視秦朝為「閏朝」或「斷裂」的看法。

著者在第五章裡探討了一件歷史大事，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下令禁止「私學」，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焚書」事件。這起事件經常被用來證明秦朝的法家獨裁專政。從西漢後半期起，歷代儒者及近代學者都不加別擇地視為迫害儒生的鐵證。與此不同，著者嘗試證明此舉本質上更接近於學問傳授的「國有化」：打壓民間私學勢力的同時，鞏固朝中博士的權力。值得注意的是，博士大都可以歸入「儒者」一類，而這批侍奉朝廷的儒者在秦代由始至終擁有極大影響力，從刻石文字的高古典雅便可見一斑。他們也很可能積極參與了「經典」的編纂甚至創作，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尚書·堯典》裡竄入了〈舜典〉，假托傳說中聖王舜的故事，證明天子巡幸的新近傳統古已有之。此外，著者敏銳地察覺到秦朝抑制私學，實與漢武帝建元五年（前 136）下詔「罷黜百家」根本上並

6 董仲舒提議黜秦於正統朝代之外，故其構建的歷史循環論中沒有秦的位置，參見 Gary Arbuckle, "Inevitable Treason: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Historical Cycles and Early Attempts to Invalidate the Han Mandat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4 (1995): 585–97。董仲舒的黜秦說在西漢後期尤為盛行，在中國帝制時期始終具影響力，提出「以秦為閏位」的代有其人，詳見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

無二致，後者卻因「獨尊儒術」而贏得千秋美名。事實上所謂「法家」的秦與所謂「儒家」的漢，兩者之間後先相承的接續關係遠比後世史家（包括二十世紀大多數歷史教材的編撰者）所願意承認的來得密切。

本文想提出《秦始皇石刻》最後一項貢獻在於史學史方面。筆者所指的並非是著者在第 5-1 章中對漢代史學的泛論，而是說他真正取得的突破：斷定《史記》中至少一部分敘述絕對可靠無疑。儘管《史記》引及的秦始皇及其臣下代筆的詔令，經常被人懷疑曾遭司馬遷（或少孫等人）修改潤飾，但石刻文完全不存在這類懷疑，正好用來核實〈秦始皇本紀〉其他部分的真偽。至少我們可以假設，但凡與刻文所反映的秦帝國思想大體面貌相符的，相關記載都可被視為可靠的秦史史料。能夠在篇幅甚長而又疑竇重重的歷史敘述中辨別出可靠的部分，誠為解決古代中國史學問題的絕妙法門。今後學者動手鑽研上古歷史要籍時，都應當首先分辨出 述中哪些部分未被後世史家大幅篡改。

柯馬丁的論述儘管如此精采絕倫，自然也有需要修正或微調的地方。譬如說，他對於儒生和秦廷關係的描寫間或有美化之嫌，畢竟禁止私學對大批（或許絕大多數）儒生造成沉重打擊，甚至一部分朝中博士亦身受其害。因此前 209 年秦末民變爆發時，好幾位海內宿儒都決定投靠農民起義軍領袖陳涉，其中包括孔子八世孫、「卒與涉俱死」的孔鮒（字甲），⁷ 這些歷史細節都不容忽視。就秦代

7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一二一，頁 3116。

青銅器和秦始皇刻石兩種銘文之間呈現的整體思想延續性而言，相關論述亦有必要略作調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天命」這個概念完全絕跡於秦帝國的宣傳文告：在此前秦國金、石銘文裡「天命」往往處於重要地位，但在秦始皇刻石中卻不然，而且始皇帝的眾多稱號裡唯獨缺了「天子」，尤其礙眼。⁸ 另一個筆者不敢苟同的地方是，著者相信「因時而變」是先秦和秦漢時期所有主要思想家共同擁護的觀念。我們一旦深入考察便會發現，同樣抱持「因時而變」的觀點，大多數人只認為對現有制度作輕微修正及改動即可，但少數如商鞅、韓非子等所謂的「法家」則提出了近乎歷史進化觀的看法，主張有必要對社會政治結構和基本制度安排方面進行徹底改革。在這個關節點上，雙

8 我曾撰文嘗試解答秦始皇何以弔詭地與「天」劃清界線，見 Yuri Pines, "Imagining the Empire? Concepts of 'Primeval Unity' in Pre-Imperial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in *Conceiving the Empire: China and Rome Compared*, eds. Fritz-Heiner Mutschler and Achim Mitta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7–90 (中譯本見尤銳著，張雪婷、鄧益明譯：〈帝國的設想？——先秦史學傳統中「原始統一」的概念〉，收入朱淵清、汪濤主編：《文本·圖像·記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87–107)；及 Pines, "The Messianic Emperor: A New Look at Qin's Place in China's History," in *The Birth of an Empire*, 258–79 (中譯本見尤銳：〈有「救世主」特色的秦始皇——兼論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收入葛荃主編：《反思中的思想世界——劉澤華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67–184)。需要注意的是，撇開柯馬丁特別注重接續關係一點不談，他確實將金、石銘文嚴格區分出來，因刻石的對象並非祖宗神靈，而是用來歌頌秦朝統一天下，青銅器的作用則截然不同。

方的觀點截然不同。正如我在別處論及，秦始皇採納了後一種少數派觀點，使秦朝大異於後來的帝制政權。⁹

著者如此尺幅千里的豐富討論，勢必留下不少未能解答的疑問，其中有些問題更可能沒有答案。其中一個最有意思的問題是，石刻文在納入司馬遷的敘述前是以甚麼方式流傳？秦朝官員會否把刻文抄寫在竹帛等易損壞的材質，然後散發給普羅大眾？從秦權、秦量大都載有自我誇耀的詔文可見，秦朝政權極其重視政治宣傳，因此大有可能將刻石文字書於竹帛。¹⁰ 這樣的話，王充所說「觀讀」刻石便不難理解了。¹¹ 假如這個推斷正確，便有助闡明秦朝滅六國後如何大力向被征服者進行政治宣傳，而這正是陳力強（Charles Sanft）新著的研究主題（見注 10）。

《秦始皇石刻》還帶出了許多別的問題，為今後更深

9 Yuri Pines, "From Historical Evolution to the End of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from Shang Yang to the First Emperor," *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an Fei*, ed. Paul R. Goldin (Dordrecht: Springer, 2013), 25–45; Pines, "The Messianic Emperor," 258–79.

10 朝廷按照度量衡新制鑄造了一系列秦權和秦量，器上均刻有秦始皇詔文，開首云：「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見王輝、程學華：《秦文字集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年）。陳力強曾對這類詔版的內容，及其對秦朝向下層民眾進行政治宣傳時所起的作用有精采分析，見 Charles Sanft 陳力強，*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ublicizing the Qin Dynasty*（早期帝制中國的溝通與協作——秦王朝的宣傳工程）（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57–76。

11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二十〈須頌篇〉，頁 855。柯馬丁於第五章第一節引及此文，見中譯本頁 149。

入的研究和嶄新的研究起點奠定了基礎。著者富有遠見地在〈導言〉中寫道：

本研究的結論……毋寧說只是一個開始……觸發了我們對早期帝國時期解讀中的諸多問題，需要的不是一個章節，而是系列的專題論文對之作出審慎研究。（中譯本頁8）

事後證明這一看法異常正確。本書確實極具影響力，筆者個人的體會尤深。柯馬丁融會古文字材料和傳世文獻的功力深湛，加上敢於重新評價秦朝在中國歷史的地位，激發我去仔細審視秦國發展軌跡、秦文字、秦帝國意識形態、與秦代相關的史學材料，以及本書粗略提出的其他問題。更廣泛而言，眼下秦研究已成為西方漢學的一門顯學，筆者相信《秦始皇石刻》一書對其整體復興起了相當大的作用。¹² 這本精湛論著定必對此一領域有深遠影響，著者大可引以為榮。

12 筆者的秦研究論著，參見注5、8和9，另見 Pines, “The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Qin History in Light of New Epigraphic Sources,” *Early China* 29 (2004): 1–44；Pines, “Biases and Their Sources: Qin History in the *Shiji*,” *Oriens Extremus* 45 (2005–2006): 10–34。其他明顯受柯馬丁啟發的秦研究主要著作，見陳力強的《早期帝制中國的溝通與協作》及其早年論文，如 “Progress and Publicity in Early China: Qin Shihuang, Ritual, and Common Knowledge,”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22.1 (2008): 21–43。此外還有尤銳等主編 *The Birth of an Empire* 所收的文章。